

# 葡文资料中的徐光启与明末上海

董少新

关于徐光启的研究,学界已经做得比较深入了,前面的学者也已经从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我对徐光启没有专门的研究,2002年为了做博士论文到葡萄牙收集资料,偶然在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发现了一些关于徐光启和明末清初上海的葡文手稿资料,觉得很有价值,便将其中一部分复印回来;由于当时的工作重点是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所以没有将有关徐光启的葡文资料都复印回来。为了参加这个会,我将这些资料略作整理,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葡文资料的情况。

第一,讲一下葡文文献的重要性。葡萄牙与西班牙是欧洲人开展海外事业的先驱国家。为了保障海外殖民的成果,葡西两国大力支持天主教的发展,积极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并与罗马教廷达成协议,各自拥有保教权区域,葡萄牙的保教权主要在东方,包括非洲、印度、东南亚和远东。葡萄牙语成为16、17世纪东西方贸易和天主教在东方传播的主要语言。不仅东来的西方商人和各国传教士以讲葡萄牙语为主,就是葡萄牙在东方的商业据点和贸易区域的当地人,也有一些懂葡萄牙语的人。

16世纪,中西方开始了影响深远的直接接触与交往。早在1514年,第一个葡萄牙船队在商人欧维士的带领下出现在中国广东沿海的屯门与中国进行贸易。1517年首位葡萄牙使节皮莱资访华。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了在澳门的居留权,开始与中国开展稳定的贸易。澳门甫一开埠,便有西方传教士到那里传教,并为进入中国作准备。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进入肇庆传教,将中国纳入其传教的版图。罗明坚和利玛窦都懂葡萄牙语,他们到达中国后为了学习汉语,编撰了一部《葡汉词典》。根据法国学者荣振华的统计,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中有葡萄牙人336人,其数量远远多于其他欧洲国家来华传教士,其中也不乏颇有影响的传教士,如澳门第一位主教加内罗、为瞿太素和徐光

启洗礼的罗如望、在华四十余年并著有《中国分期史》、《远方亚洲》等名著的何大化,以及安文思、曾德昭、傅泛济、徐日升等等。葡籍传教士以及其他国家的传教士,留下了大量的葡文文献,包括书信、报告、游记及关于中国的各种早期汉学研究作品等。目前这些文献主要保存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地,它们不仅是研究明末清初中西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中国区域史、社会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是中文史料的补充。

阿儒达图书馆收藏的“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文献,共计61大卷,主要是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在华耶稣会士留下的关于中国的各种记录,非常珍贵。这些文献都是手稿,是研究这一时期中西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有关徐光启和明末上海的一些葡文文献就包含在其中,这也是我今天将给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

第二,关于徐光启的葡文文献。明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面对出现在中国境内和边境的西方人,中国士大夫表现出了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可以借西方的文化对儒家思想进行补充和改进,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保卫国家,抵抗外族入侵;另一方则认为西方人在华用邪教蛊惑人心,在海疆屯兵,覬覦中国,主张将其逐出中国,防患于未然。

徐光启早年在韶州便结识了郭居静,1603年在南京领洗入教,此后他一直与传教士保持密切的联系,潜心研究和传播西学。1630年1月3日,清兵攻到了京师的德胜门,形势危急。1月11日崇祯皇帝接受徐光启意见,利用葡兵、火器击退清军。2月13日,清兵退出关外。于是,徐光启上疏,希望派人前往澳门招请更多的葡兵,但是这一建议为以香山县人、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为首的保守派所强烈反对。双方在此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斗争。有一些葡文文献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主要见于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编号49—V—9和49—V—8两卷中。

关于明末招请葡兵抗清,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最新的研究可以参见汤开建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sup>①</sup>但是以往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批葡文文献。在49—V—9这一卷中,有九份文件是关于此事的,主要是双方的奏疏、信件及崇祯皇帝关于此事的上谕,例如:(1)1630年7月初广东香山县人礼科卢兆龙反对引进葡兵折及7月7日上谕;(2)1630年7月12日徐保禄力保葡

葡萄牙人折及7月14(崇祯三年六月初五日)上谕;(3)1630年7月17日礼科卢兆龙反徐保禄的第二折及7月20日上谕;(4)中国礼部徐光启致澳门耶稣会巡按使班安德神甫书;(5)礼部左侍郎徐保禄为葡使葡人人京效力与澳交涉事三次上疏及皇帝上谕,等等。我初步对照了一下已出版的《徐光启集》,发现上述徐光启的奏疏并没有收入其中。后两种我前两年已经翻译了,其中徐光启致巡按使班安德信的葡文手稿及译文现在被放在徐光启纪念馆中展览。这些文献的原文应该是中文写成的,由传教士翻译成葡萄牙文并保存至今,成为中文资料的重要补充。例如,徐光启于崇祯三年四月十五日致耶稣会日本、中国巡按使班安德神甫的书信中,除了对澳门先前派遣葡兵表示感谢之外,还从天主教在华传播、澳门利益等角度,分析了澳门再次派遣葡兵的重要性:徐光启1630年7月12日力保葡人的上疏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使用葡兵对抵御荷兰人的重要意义。

作为明末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之一,徐光启在护教、宣教以及融合儒天思想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教会文献对徐光启有许多记载,就葡文文献而言,有(1)徐光启致红衣主教贝拉尔米诺(Belarmino)书,此信是对该红衣主教致中国教徒书的回复;(2)徐光启恳请赴京使节宣教中国。这两种文献也都未见于《徐光启集》。(3)更多的徐光启葡文文献见于耶稣会中国年报中。在1633年徐光启去世之前的十几年中,几乎每年的耶稣会中国年度报告都会谈到徐光启的情况。例如在1623年的年报中,说徐光启经常资助教会,称他是传教士的衣食父母,是教会最忠实的朋友。在1633年的年报中,更是以近20页的篇幅对徐光启一生的主要事迹进行了回顾。在此后的年报中,每当谈到上海教务发展情况时一般都会涉及徐光启家族、后人的贡献。这部分资料在徐光启的研究中更是少有使用,因为基本上都是表现作为教徒的徐光启,而不是作为科学家的徐光启。但是这部分资料却能够很好地反映徐光启对明末天主教的重要作用及明末中国高级官员与西方的交流情况。

第三,关于明末上海的葡文资料。1608年郭居静应徐光启之邀到上海县传教,是为上海开教之始,不久上海便建立了传教驻地。由于徐光启的影响力,天主教在上海发展顺利。在每年的耶稣会中国年报中,上海驻地都占有一定的篇幅,主要介绍一年中上海教务发展情况,比如有哪些传教士在此传教、多少人洗礼成为教徒、其中有多少人属于士人、各种类型的教友会的活动情况等;有的也介绍上海自然地理概况、风土人情等。目前我所掌握的年度报告中,1644年以

<sup>①</sup> 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前的有二十余份,每一份都包含上海驻地的内容。此外,传教士在嘉定、松江都建有传教驻地,这两个驻地的教务情况也都见于年报中。这些资料不仅是研究上海天主教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明末上海社会史的重要参考。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当时在上海传教的西洋人留下的,他们或以外来者的独特视角观察上海,留下当时中国学者并不注意的一些情况。以下是郭居静神甫在上海居住一年后对上海的描述,所提供的信息或可作为纺织材料的补充:

南京省的上海县离松江府不远,距省城 15 里格,几乎位于东海海边,与日本毗邻,所以总是驻兵把守。城墙周长约三分之二里格;房屋与楼宇富丽堂皇,无论是数量还是气派程度都不逊于府城,因为这里人杰地灵,出了很多进士,所以整个城市到处住着退休的官员。城中共有四万户人家,地貌则无山无丘,一片平地;城墙外村庄相连,比城中人口更多。每年缴纳赋税三十万两银子,其中一半用稻米上缴,另一半则用白银上缴。盛产稻米和棉花,所生产的棉布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外销到周边国家。整个上海拥有两万台纺织机。纺织工无论男女还是孩子,均技艺娴熟,用脚转动轮子,手指间则牵三条棉线,形成一束,缠绕于三个纺锤上。我在此一年了,当我走在街上,所见最多的就是飞速纺织的女纺工,多得让人吃惊。此地靠近海边,上海由此得名。这里的空气非常宜人,有很多年过八旬的老人,也不乏百岁人瑞。<sup>①</sup>

以上便是我在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所见到的关于徐光启和明末上海的葡文资料情况。鉴于这些资料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又十分重要,所以希望以后能够有时间和机会,将所有葡文相关资料收集齐全,并翻译注释出版。当然,这些葡文文献或为传教士所写,或为传教士所翻译,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与中文资料相互参证。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

<sup>①</sup> Asia Extrema, Livro 4, Capitulo 11, pp. 239 - 240.